

台灣反對運動四十年

摘自
神州
一九四九年十月
卷一
第...期

台灣將於今年年底舉行中央與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包括立法委員、省市議員、縣市議員、縣長），這是蔣經國逝世後的首次大型選舉。對於在台灣執政四十年的中國國民黨而言，今年的選舉可謂攸關至鉅，必須全力以赴，如果仍能獲得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選票，則可驗證民衆對國民黨處於當前開放與競爭局面時的支持態度，換言之，「一黨獨大」之局可以維持。然而，偶有差池，讓反對力量（民進黨）攻城略地，則不但現政權受到嚴峻挑戰，而統治的合法性也可能因而動搖。

執政國民黨在沒有完全把本身的體質作根本改變的時候，即是說仍然是一個「革命民主政黨」而不是議會式的政黨，就貿然實施取材自美國的初選制度（今年選舉的黨內提名採取黨員初選方式），與其說是反映國民黨實施民主憲政的決心，毋寧說是國民黨在「內憂外患」中不得已的一種辦法。強人政治結束，誰也不怕誰，國民黨內部力量的重新整合，不能再以由上而下的權威領導方式進行，而面對民衆日高的期待和反對力量的抗衡，黨內民主化似乎是別無選擇的唯一肆應之道。

國民黨在今年年底選舉的成敗問題，目前仍然言之過早，本文擬從台灣政壇上反對力量的發展，探討朝野政治勢力的互動或者消長與政黨政治發展的關係。

日據時代的民主運動

探討台灣政壇上反對力量的發展，應回溯到台灣在日據時代的抗日運動和國民黨遷台後早期的地方自治。

在本世紀初，由於西方民主思潮的影響，加上中國革命、俄國革命及世界各殖民地要求獨立的衝擊，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產生了自覺運動，向日本統治者要求自治，當時的台灣省籍政治菁英如林獻堂、蔣渭水、連溫卿等人，以議會改革方式爭取民權，並組織政黨，但在日本殖民政府的鎮壓下，台灣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僅維持了三年七個月的生命。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台灣光復。國府委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長官，從日本人手中接收台灣，陳儀是典型的國民黨軍閥，台灣在他的治理下發生「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緝私官員開槍誤殺買私煙老婦，引發全省暴亂，後陳儀被槍斃），造成難以填補的省籍鴻溝，日後的台灣政治異議者大多是台灣本省人，其故在此。

一九四九年十月，大陸淪入中共之手，國府遷台，翌年實施地方自治，首次舉辦地方公職人

員選舉。由於國民黨初到台灣時，對地方選舉採取放任態度，在一九五一年的第一屆縣市長及臨時省會議員選舉中，「無黨無派」（以別於國民黨籍候選人）的政治人物，得以贏取百分之廿四的席位，形成日後政治反對力量在地方上的基礎。

一九五四年第二屆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國民黨向下紮根有了成效，「無黨無派」的政治人物面臨強大挑戰，言論轉趨激烈，開始正式以國民黨為抗爭對象，但是選舉結果比起第一屆差得很遠，「無黨無派」的政治人物在縣市長方面僅得百分之十的選票，而省議會方面則獲百分之十八的席位。

在激烈的選舉中，產生了不少「無黨無派」選戰英雄，如擊敗周百鍊的台北市長高玉樹，擊敗林金生的嘉義縣長李茂松，及省議會的「五董一鳳」李萬居、吳三連、郭國基、郭雨新、李棧源和許世賢（女）等。這個時候的「無黨無派」者反對聲浪升高，反國民黨的旗幟鮮明。

上述「無黨無派」的政治異議者都是台灣本地人士，經過多年經營，已各自形成山頭，雖然也有互通聲息，但由於政府嚴禁組黨，距離「組織化」的門檻尚遠。

《自由中國》的悲劇

除了這股地方勢力，從大陸赴台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也逐漸形成另外一股反對力量。一九四九

年十一月，雷震、胡適等人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介紹西方民主政治觀念，並以此批評現實政治。《自由中國》的成員大多為外省籍知識分子，如雷震、傅正（現為民進黨中常委）、殷海光，著名學者如毛子水、杭立武亦是主要撰稿者。

說到杭立武，當時是教育部長，是一位傾向自由主義的國民黨人，對於《自由中國》的「民主救國民黨，以團結促進社會和諧」的觀念十分讚賞。《自由中國》創辦初期，經費是由教育部補助的。

由於《自由中國》初期只是書生論政，並未涉入實際政治活動，加上主事者如雷震（國民黨人）、胡適與國民黨領導人關係密切，所以儘管月且國事、評論時政的立場與當道不合，仍能繼續發行，並且成爲在野思想的主流。但是這一批論政的外省籍知識分子，後來與源於地方選舉的台灣籍政治異議者結合起來，並在組織政黨的目標上滙合，引起國民黨的「關切」，使《自由中國》這股反對力量遭到悲劇下場。

一九五八年，李萬居、郭國基、高玉樹等十八人申請成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集合一批於一九五七年選舉後爭得不少群眾認同的本地政治人物。《自由中國》立即表示支持，並開始發表「反對黨」的論文，以配合前者「結社」的活動。執政當局引用「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加以禁止，造成朝野之間的激烈論戰，《自由中國》成爲爭論的主要戰場。胡適當時也會在《自由中國》撰文，主張由教育界、青年、知識分子出來組織一個不希望取得政權的在野黨。

不過，他的主張在當時對抗氣氛高漲的政治環境下，被視為保守。

一九六〇年，民社黨、青年黨與無黨派人士舉行「地方選舉檢討會」，會中郭國基等人要求民、青兩黨自動解散，和台灣本地政治人物合組新黨，但無結果。同年年中，雷震與李萬居、高玉樹等人先行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並吸收會員，又在各縣市設立分會，準備向組織反對黨目標邁進。六月十五日，「選舉座談會」選出五十五位委員，並發表國是聲明，其中一段震撼了國民黨當局：「我們爲了全面改革中國政治，鞏固反共復國基地，促成民主政治之實現，決定團結海內外民主人士，並與民青兩黨協商，立即籌組一個新的政黨，爲真正的民主而奮鬥，務使一黨專政之局永遠絕跡於中國。」十日之後，「選舉座談會」更在《自由中國》社址舉行會議，李萬居發表組織反對黨的談話。到了這個時候，國民黨開始予以圍剿。黨營的《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新生報》指出，組織反對黨是中共統戰的陰謀。這在今天看來當然十分可笑，但當時大陸失陷的創痕猶新，國民黨一方面爲了鞏固統治地位，另一方面又恐怕反對黨成立後，會造成政治分化和對立，有利中共滲透，於是採取消極否定的態度。

再者，國民黨認爲大陸淪入共黨之手，其中一個原因是四八、四九年間大陸「民主同盟」等自由派人士，對國民黨抨擊、污蔑，使中共乘機坐大，以昔視今，不免也把雷震等人與大陸時期的羅隆基等人劃上等號。

但是，雷震等人組黨的意願並未因國民黨圍剿而冷卻，一個名爲「中國民主黨」的政黨預算

於一九六〇年九月成立，雷震是新黨籌委會常委兼發言人。九月四日上午九時，雷震以「涉嫌叛亂」及「《自由中國》半月刊違法言論有助共黨宣傳」之罪嫌，遭警備總司令部逮捕，同案被告還有劉子英、傅正等人。十月八日，雷震被判十年徒刑。「中國民主黨」因爲雷震的繫獄而流產，台灣的反對運動亦因而止息了一段時期。

雷震於一九七〇年九月刑滿出獄，隱居著書，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病逝。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逝世後，台灣有人爲他翻案。雷震雖然生不逢時，但是他爲民主政治畢生奮鬥的精神，爲台灣的反對派留下典型。

蔣經國支持的「新生代」

一九六〇年九月雷震案之後，反對派組黨之聲歸於沉寂，不過其後十年，「無黨無派」人士依然在地方選舉中維持相當的實力。有人認爲雷震案後的十年，是台灣民主運動最暗淡的時期，雖然期間《文星雜誌》崛起，但僅止於文化論戰，和出了一個「頑童」李敖而已。

到了七十年代，國際形勢丕變，國府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保釣事件、退出聯合國、與日本斷交等連串挫折，使知識分子覺醒運動有了客觀的條件，台灣青年迸發出對國家和鄉土的關心和熱愛，一股青年問政的浪潮乃乘時而起。

這個時候，蔣經國已經進入國民黨的權力核心，而青年建言運動和改革運動亦告展開。

一九六九年創刊的《大學雜誌》成爲七十年代台灣改革運動的主流力量。

這本刊物是繼《自由中國》半月刊後，本地人與外省人的第二次結合，不同的是，《自由中國》半月刊是外省籍知識分子與本省籍政治人物的結合，《大學雜誌》則是在國民黨新領導層的主導下，網羅當時在學術界、教育界、政治界、經濟界的新生代一流人才，即所謂青年才俊，藉以打破省籍之界線。

這些「青年才俊」包括關中、魏鏞、施啓揚、李鍾桂、孫震、沈君山、楊國樞、張潤書、張系國、丘宏達、文崇一、許信良、張俊宏、陳少廷、陳鼓應等，後來分別成爲各界的重要人物。這批「新生代」結合在一起，以《大學雜誌》爲基地，公開向當局提出改革的意見。

當時的政治禁忌雖多，但這些「青年才俊」並不是異議分子；而是敢於挑戰國民黨保守勢力的國民黨「新生代」。有人甚至認爲這是蔣經國與青年知識分子聯合，反抗黨內老一代，以遂革新保台的目的。

《大學雜誌》初期發行人張俊宏（現爲民進黨秘書長）曾經爲文憶述七十年代言論廣開、一片革新氣象的情況：

「新生代主動結合在一起，不分畛域，透過刊物具體而積極的表達他們對共同前途、目標和體制的看法……另一方面，「權者」表現得又是那麼謙沖、寬懷，像是龐然大度、悲天憫人的長

者，吸納了所有新生代的智慧，主動地攤開一條大道，讓新生代的洪流在那裏奔騰馳騁。」

《大學雜誌》由於得到國民黨改革勢力的幕後支持，大部份的「青年才俊」被吸納到執政當局的「技術官僚」架構中，成爲國民黨的新生勢力，這些人後來都進入國民黨的領導階層，如施啓揚現爲行政院副院長，他的太太李鍾桂是國民黨婦女工作會主任，並兼救國團主任；關中爲國民黨副秘書長兼組織工作會主任，其他如魏鏞、孫震、沈君山等人皆曾先後擔任要職。

「黨外」運動

同時，《大學雜誌》也產生了一批後來的「黨外」健將，如張俊宏、許信良等都是脫離國民黨，成爲敵對勢力的主流人物。張俊宏、許信良原爲國民黨新生代政治菁英，他的轉變其實也有背景，那就是《大學雜誌》的改革運動無法滿足他們，加上在參與選舉的過程中與國民黨基層黨工對立，於是唯有脫黨，轉而與「黨外」人士結合。

張俊宏、許信良崛起，使台灣反對陣營開始以知識分子爲中堅，原來的地方草莽英雄反而居次。

在張俊宏、許信良之前，「黨外」產生了兩位日後成爲領袖級的人物，一是黃信介，一是康寧祥。前者出身台北世家，當過臨時台北市議會議員，七十年代補選立法委員時進入立法院，成

為「終身」立法委員，後者則原為加油站工人，先入台北市議會，後躍進立法院。一九七五年，黃信介與康寧祥合辦《台灣政論》雜誌，由張俊宏編輯，後來加入因案被停職的宜蘭縣礁溪鄉長張金策及甫出獄的黃華，法律顧問則是年輕的律師姚嘉文（後來成為民進黨第二任主席）。《台灣政論》言論激越，銷路奇佳，但壽命也奇短，出了五期即被當局勒令停刊。

《台灣政論》停刊後，部份異議人士開始走上暴力之路，並與海外「台獨」分子掛鉤，當時的省主席謝東閔被郵包炸彈所傷，間接導源於此。

今天台灣民進黨部份人士主張「台獨」，追本溯源，與海外「台獨」運動不無關係。

「黨外」一詞在這個時候成為政治反對力量的統稱，也是民進黨的前身。國民黨則以「無黨籍人士」代替「黨外」一詞。

「黨外」一詞容或不通，但在民進黨成立之前，它是台灣反對陣營的代號，有人甚至將反對派的運動稱為「黨外運動」。其實，在國民黨之外還有兩個歷史悠久的政黨（民社黨、青年黨），但是兩黨長年積弱不振，被譏為「花瓶政黨」，當然無法制衡國民黨，在野地位被一個不能稱為政黨的「黨外」所取代。

「黨外運動」漸成氣候，台灣的反對政治進入一個新的里程。

一九七七年的「中壢事件」與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雖是「黨外運動」走向暴力邊緣的結果，但台灣政壇的反對勢力却因而重新整合，而國民黨亦改變專擅的心態，開始與「黨

外」人士溝通。

中壢事件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桃園縣中壢市的一個投票站，爆發群眾暴亂事件，群眾燃燒了中壢警察分局，釀成兩死一傷慘劇。「中壢事件」的主角是後來流落美國的許信良，當時他在競選桃園縣長。許原為國民黨員，脫黨後當選桃園縣長，後來因案流亡海外。許信良於「中壢事件」十年後在紐約接受台灣一本反對派雜誌訪問時說：「中壢事件是台灣近數十年來民主運動的一個分水嶺，人民發現自己有能力，以後就更大膽、更勇敢。」許信良並且說：「中壢的火燒掉的不只是一個小小的警察分局，燒掉的是凶霸和黑暗，也燒掉人民對政治的恐懼和冷感。」

就在這一年的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黨外」獲得空前的勝利，許信良、黃友仁、曾文坡、蘇南成（原為國民黨員，脫黨參選，後來又重回國民黨懷抱，現為國民黨中常委，高雄市長）分別奪得桃源縣長、高雄縣長、台中市長和台南市長職位，佔全省各縣市長百分之二十，此外在台灣省議會也取得二十一席，佔百分之二十七。國民黨在這次選舉中，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敗；而對突如其來的「中壢事件」，表現也是出奇的寬和。因此，「黨外」人士有點給勝利沖昏了頭腦，誤以為已有足够的力量對付國民黨，於是就「更大膽」、「更勇敢」，結果埋下另一次

暴動的火種。

美麗島事件

「黨外」人士不以地方政權為滿足，開始要逐鹿「中原」。

一九七八年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額選舉，「黨外」人士組成助選團及成立競選總部，由施明德（現仍在獄）擔任總幹事，並推出候選人，儼然以政黨姿態出現。

同年十二月五日，「黨外」人士以《美麗島雜誌》名義在台北中山堂集會，由黃信介主持，到會約四、五百人，是台灣反對勢力三十年來第一次盛會，但會中將國歌歌詞「吾黨所宗」改為「吾人所宗」，因而與一個極右團體《疾風》雜誌的人衝突起來，勞政武、蕭玉井等幾名《疾風》人士被毆傷，是謂「中山堂事件」。十二月十五日，美國宣佈與中共建交消息傳來，全島震驚，蔣經國總統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所授權力，下令中止是年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額選舉。執政當局的理由是加強內部團結，因應突如其來的外交變局，而「黨外」則認為是國民黨權威統治的壓制，雙方的猜忌日深。

一九七九年一月，高雄「黨外」耆宿余登發因為「知匪不報」被判刑，「黨外」人士齊集高雄示威遊行。余登發號稱「南霸王」，是台灣南部高雄最大地方派系「黑派」的「掌門人」，有龐大的群眾基礎，他的女婿黃友仁、女兒余秀鸞、媳婦陳月英、孫女余雅玲，分別擔任縣長、立法委員、省議員等職，政治勢力穩固。「黨外」主流派黃信介等人聲援余登發，顯示「黨外」有意聯成一氣。

一九七九年六月，「黨外」總部「台灣黨外民意代表聯合辦事處」在台北市成立，八月十五日《美麗島雜誌》創刊，「黨外」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美麗島雜誌》創刊前，「黨外」已開始鬧分裂，康寧祥的《八十年代》雜誌，主張溫和路線，但「黨外」大多數人正在迷戀激烈手段，對群眾運動也過度自信，康寧祥自然受到排斥。

「美麗島」的「五人小組」包括黃信介、張俊宏、林義雄、施明德，隱然成爲「黨外」領導核心，他們都傾向於暴力。

《美麗島雜誌》自許爲「台灣民主運動雜誌」，是「黨外」的宣傳重鎮，具備反對黨的雛形。該刊在台灣各重要城市設立服務處，建立類似地方黨部的機構，並舉行連串演講、座談、遊行、逐步闖入政治禁區。

當時，以「美麗島」爲核心的「黨外」人士爲了提高政治對抗層次，提出所謂「法律邊緣」的戰術。這是姚嘉文發明的，意思是說「黨外」搞的激烈群眾行動，如國民黨不予制止，則可得寸進尺；如國民黨予以鎮壓，「黨外」則可塑造被壓迫形象，爭取群眾同情和支持。當國民黨陷入兩難之局後，「黨外」便可予取予携。

同年十二月十日晚上，「美麗島」人士在高雄舉行「人權日」遊行示威，釀成騷亂事件。「美麗島」發動的遊行示威，衝破了法律堤防，由於預先帶備火把、木棍，一旦衝突起來自然不可收拾。一百八十三名憲兵、警察、民衆在這次騷亂中受傷，執政當局乃採鐵腕措施，有關單位在不足五十小時內，蒐集了「美麗島」發動暴亂的證據，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全面查封「美麗島雜誌社」所有辦事處，同時逮捕涉及暴力事件的人。

十二月十三日，「黨外」知名人士張俊宏、姚嘉文、王拓、陳菊、周平德、呂秀蓮、林義雄、楊青矗等被捕；十四日，經立法院同意後，治安機關逮捕立法委員黃信介。施明德化裝易容逃亡，一個多月後亦告落網。所有涉事者分別接受司法審判及軍法審判，分別被判處無期或有期徒刑（目前除施明德仍在服刑，其餘皆已假釋）。「黨外」菁英因高雄暴力事件身陷囹圄，「美麗島」至此瓦解，「黨外」運動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

高雄暴力事件是「黨外」「法律邊緣」戰術的必然結果，而國民黨則以哀兵、弱者的形象出現，相信是「黨外」預料不到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形象深入民心，相對之下，「黨外」却不幸淪為「暴力團體」。

「黨外」把多年累積的政治資本在高雄暴力事件中全部押下去，結果全軍盡墨。輸掉了人心，也輸掉了一批政治菁英的自由，代價實在太大了。經過這次大劫之後，「黨外」僅有康寧祥殘存下來。

「黨外」力量再起

經過一年時間的整合，「黨外」逐漸恢復元氣。一九八〇年底舉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額選舉，若干高雄事件受刑人家屬及辯護律師參選，造成一股旋風。這些以「被壓迫者」姿態出現的「黨外」候選人獲得民衆同情，紛紛以高票當選，如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當選國大代表，張俊宏的妻子許榮淑當選立法委員，黃信介的弟弟黃天福當選立法委員，律師尤清、張德銘分別當選監察委員和立法委員，其他擔任《美麗島雜誌》社務委員的「黨外」人士也多當選，共有十二人取得中央民意代表席位。一九八一年省市議員選舉時，甫當選中央民意代表的「黨外」人士組成聯合助選團，提出推薦名單，結果也有三十多人當選，成果豐碩。

自從「黨外」在中央及地方選舉取得相當席位後，逐漸分成三條路線，其一為「主流派」，即在高雄事件後帶領「黨外」前進的人，如康寧祥、尤清、費希平、張德銘、黃煌雄。這些人主張走議會路線，與國民黨抗爭採取溫和節制的方式。可惜他們很快就被其他力量所取代，康寧祥選受到批鬥，被「黨外」新生代指為「放水派」（在今天的民進黨內部，康系屬少數派）。第二條路線是「受刑人家屬派」，如周清玉、許榮淑等人，他們對於實際政治缺乏概念，當選中央民意代表是因為獲得群眾同情，面對實際政治運作時，特別在議會問政，顯得有點情緒化。不過，

這些人的身旁，出現了一批二十出頭的「黨外」新生代，做他們的幕僚，後來這些人也成為政壇上反對力量的一個重要派系。第三條路線是所謂「獨立人士」，憑藉地方山頭的力量，在「黨外」佔一席位，如余登發、蘇秋鎮。

這時「黨外」人士的特色是靠政治實力來決定他的地位，「黨工」型人物不易立足，唯有透過選舉擁有公職才有地位。這也導致民進黨成立後的派系鬥爭，擁有公職者與黨工在主張和路線上有重大分歧。

八十年代初期的台灣「黨外」，除了靠選舉來顯示實力，選辦雜誌來建立灘頭陣地。

在眾多「黨外」雜誌中，以下的幾本最具影響力：

一、《八十年代》系統刊物：這是康系的雜誌，包括《八十年代》、《亞洲人》及《暖流》。這些雜誌在高雄事件前已存在，但由於當時的《美麗島雜誌》受歡迎，顯得黯然無光。高雄事件後，康系得以抬頭，而這系雜誌的穩健批評路線也頗合潮流，於是逐步建立了地位。康系雜誌由被稱為「黨外祭酒」的司馬文武主持（原名江春男，曾任職《中國時報》，現為台北《新聞周刊》發行人）。

二、《深耕》雜誌：早期的《深耕》由張俊宏妻子許榮淑任發行人，林正杰任社長，林世煜當總編輯。這本雜誌有濃厚的本土意識，批判性極強。一九八二年，更將炮口朝內，實行批康（康寧祥）。《深耕》被勒令停刊後，改以《生根》為名出版。

三、《關懷》雜誌：高雄事件受刑人姚嘉文妻子周清玉主辦，專門揭露社會陰暗面。

四、《代議士》雜誌：「獨立人士」蘇秋鎮主辦，充滿個人色彩。

五、《鐘鼓鐸》雜誌：黃信介弟弟黃天福主辦。

六、《民主人》雜誌：前身是《政治家》雜誌，主辦人為鄧維楨，原走中立路線，後向「黨外」靠攏。

七、《博觀》雜誌：尤清主辦，從事理論批判，常遭停刊處分。

八、《前進》周刊：這是林正杰當選台北市議員後所辦的雜誌，走新聞路線，銷路不惡，對國民黨的傷害最大。

八十年代初期，「黨外」雜誌百花齊放，打破了很多政治禁忌。

民進黨的成立

台灣的反對運動，由「無黨無派」至「黨外」，期間經過無數的衝擊，自從黃信介、康寧祥崛起後，「黨外」成為政治異議人士的共同稱號，在這個籠統的稱號下，異議人士亦由各自孤軍作戰演變成爲有組織的團體和一股逐漸凝固的反對力量。高雄事件之後的兩次選舉，投身「黨外」的人愈來愈多，「黨外」政論雜誌如雨後春筍，但「黨外」陣營也愈來愈複雜。

這時候，一批「黨外」雜誌的年輕編輯乘時而起，這批名爲「黨外」新生代的年輕人，首先向康寧祥開炮，展開批康運動。其實這是「體制內改革」和「革命」兩種不同主張的鬥爭。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八日「黨外中央後援會」成立後，鬥爭更加白熱化。

「黨外」新生代主張參加選舉的候選人，要經「後援會」內部初選通過後才能參選，但康寧祥則認爲「後援會」應保障現任公職者的競選權利，雙方爭持下去，最後新生代成立「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簡稱「編聯會」），與「後援會」對抗。

這時「黨外」一分爲二，「後援會」與「編聯會」鬥爭不斷。到了八四年三月十一日，由部份現任及前任「黨外」公職人員組成的「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成立，立法委員費希平任理事長，林正杰任秘書長。「黨外」開始向組織反對黨目標邁進。八六年三月，「公政會」醞釀在各地成立分會。

執政當局雖然表面要取締「公政會」，但爲了化解衝突，政治溝通開始出現。是年五月十日，國民黨元老陶百川、台大教授李鴻禧、楊國樞、胡佛出面，邀請國民黨與「黨外」人士代表會談。由於雙方歧見甚深，溝通並不成功，但已開先例，加上國民黨在蔣經國主導下，準備深入研究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等幾個重大問題，朝野間出現一片祥和氣氛。「黨外公政會」成立後，執政當局未予取締，「黨外」人士於是建立了組黨的基礎。

一九八六年九月廿八日，「黨外後援會」在圓山飯店召開推薦候選人大會，但結果出人意

表，變成民進黨成立大會。江鵬堅被選爲第一任民進黨主席。

翌年，國府宣佈解除戒嚴、開放黨禁。民進黨終於成爲台灣四十年來第一個合法的反對黨，與國民黨在體制內抗衡，台灣邁入了政黨政治的第一個階段。

執政的國民黨在「後蔣經國時代」也準備更新改造，迎接反對力量的挑戰，兩、三年來，朝野政治勢力互動加劇，民進黨作爲一個最大的反對黨，雖然內部分裂加劇，「美麗島系」（「自決派」）與「新潮流系」（「台獨派」）鬥爭不斷，但也頗知節制。如果稍爲樂觀一點來看台灣的政治發展，中國有史以來最民主的政治體制，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可在台灣落實。

結語

檢視台灣政壇上反對力量四十年來的發展，初期雖覺緩慢，但由於大部份政治異議者都能以溫和、理性、節制的方式行事，加上台灣經濟發展迅速，帶動了政治改革——政治和經濟從來都是互相影響的。在朝野互讓、互諒之下，反對派的政治空間得以開拓。在近代中國，不必流血而達成的政治改革並不多見，國民黨與反對派人士都應獲得國人的掌聲。

（原載一九八九年九月號《明報月刊》）